

CHINA AGAINST THE TIDES

反潮流的**中国**

Marc Jeremy Blecher

[美]白瑞琪 /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Marc Jeremy Blecher

反潮流的中国

[美]白瑞琪 /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7 - 98 - 25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潮流的中国/ (美) 白瑞琪 (Blecher, M.) 著; 孟庆龙等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1

ISBN 7 - 5035 - 1885 - 5

I. 反… II. ①白… ②孟… III. 中国 - 现代史 - 1949 - 研究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2337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63 千字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译者的话	(1)
------------	-----

中文版序	(4)
------------	-----

前 言	(7)
-----------	-----

鸣 谢	(8)
-----------	-----

绪 论	(11)
-----------	------

第 1 章 中国为何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大环境 与小环境	(21)
中华帝国及其失败	(22)
共和的失败	(32)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兴起和胜利	(37)

结论	(53)
----------	------

第 2 章 辉煌与挫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1949—1978 年)	(67)
1949—1952 年：恢复和巩固	(67)
1953—1957 年的社会主义过渡	(81)
大跃进	(101)
恢复、调整和政治冲突	(11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18)
华国锋时期：妥协失败 (1976—1978 年)	(131)

第 3 章 成功与危机：结构改革面临挑战

(1979 年以后)	(134)
毛主义领导层和思想体系的解体	(135)
结构改革之争	(139)
结论	(173)

第 4 章 发展道路上的磐石：官僚体系

是否得减肥?	(176)
中国的制度结构	(177)
不断变化的中国宪法	(182)
中国共产党	(184)
政府的结构和规模	(192)
法律和立法	(198)

官方群众组织和政协会议	(202)
-------------------	-------

第 5 章	社会阶层政治化：对毛是纲，	
	对邓是绊脚石	(207)
	阶级	(207)
	男女差别	(222)
	城乡差别	(232)
	民族	(236)

第 6 章	西方人跌破眼镜：中国经济从	
	计划艰难而成功地走向市场	(238)
	毛泽东时期	(238)
	邓小平时期	(256)

第 7 章	改革能走多远：农民的向背	(274)
	集体农业及其遗产	(275)
	非集体化发展的脚印	(278)
	结论：	(287)

第 8 章	政治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还灵验吗？	(290)
	精英政治	(291)
	国家与社会	(301)
	结论：国家—社会关系中的自治	(321)



结 语 中国向何处去：四条道路…………… (324)

参考文献 …………… (332)

译者的话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欧美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著作,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人的观点、开拓视野提供了诸多方便。然而,略显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书一是多为单学科研究,其中历史学居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时间下限多为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论及近七八年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的就更少了。《反潮流的中国》一书便是一部全面研究 1996 年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新著。

英国伦敦平特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白瑞琪(Marc Jeremy Blecher)的《反潮流的中国》(《CHINA AGAINST THE TIDES》),是一部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汉学对中国现代史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很有意义的新书。该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非常独特、新颖的视角,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和许多层面,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渊源及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既简捷又深入的探讨,对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六·四”风波的深刻社会根源及其深远影响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就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了饶有兴趣的展望。

作者一直认为,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解,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因此往往对许多问题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提出让人跌破眼镜的预测。为克服上述不足,他在研究过程中很重视对中国社会进行个案研究,并多次亲自到中国做研究和收集材料工作。故他的著述具有浓厚的中国“乡土”气息,得出的一些结论甚至被某些西方人视为是替中国政府说话,故而遭致批评。总的来说,白瑞琪是为数不多的能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的西方学者之一。

在《反潮流的中国》一书中,作者尽可能地摆脱偏见,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批驳了某些流行于西方的错误观点。全书用不太长的篇幅,重点对中国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及其原因进行了剖析,并用毛泽东的名言“反潮流”,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规律作了概括。

与大多数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单从或主要从政治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发生的危机,而是把它们看成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中国色彩的自然现象。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六·四”风波,严重的社会危机固然给中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但也为下一步的变革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他通过对危机的分析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政府、国家和社会数次在生死存亡关头都挺了过来,而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垮掉和分裂,其顽强的生命力除来自中国政治和政体的特有结构外,主要产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和传统文化。他认为,轻视或夸大中国发生的危机都是不足取的,走西化之路更不能“治愈”中国本身的疾病。中国之所以能屡屡在紧急关头渡过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她自 20 年代以来一直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综合剖析之后,作者在 1996 年

(书定稿时)就指出,中国要想解决改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有必要下决心实施两项重大举措:一是精简庞大的官僚体系,二是对国民经济做进一步的结构性调整。而这都是中国现政府目前正加紧实施的改革措施的重点。

当然,虽然作者对中国十分友好,他自称尽可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发展,但他毕竟是西方学者。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不同,对他的某些分析方法和结论,我们是难以完全苟同的。

此外,我们虽然尽全力对书中列举的事实进行了考证,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有些事实还是未能查到可靠的中文出处。因此,书中的某些材料仅作参考,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

不管怎样,此书为我们全面了解西方人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看法提供了一些便利。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阅读,我们对各章的题目作了一些修改,对某些章节的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删节。

本书各章主要由王丹妮(第2、7、8章)、李小宪(第5、6章)、陈丕西(第3、4章)、杜继东(前言、鸣谢、绪论和第1章)、孟庆龙(结语及其他)翻译。孟庆龙等承担了全书的统校工作。浦安平通读了全书并对一些事实进行了查证。史柳森、张桂华、安莉、孟敏民、郭开文、邓若华、刘双芬、江文等做了部分翻译和其他工作。

特别要感谢的是,华庆昭同志除为本书的中文版权做了许多工作之外,还承担了一些重要的译校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王君同志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恳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1998年8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

白瑞琪

对我来说,能有机会出版《反潮流的中国》的中文版是一件极感荣幸的事情。这是一个推进中国人跟美国之间讨论问题的宝贵机会。然而,这个难搞的项目也使我不胜惶恐。本书的主要论点便是,西方人在试图对中国进行分析时需要十分谨慎和虚心。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由来已久:有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有时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有时则由于他们未能认真看待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所讲的话。那么,为什么我就敢斗胆向中国读者提出我对中国的认识呢?我所能说的是,在我全身心致力于了解中国的这半生中,我一直尽可能地对上而所说的局限性保持清醒,并努力克服之。我到底做得如何,只能请读者们进行评判,同时也渴望他们多提意见,以使我做得更好。

我非常感谢中国读者的宽容大度和虚怀若谷,愿意来看我这本书。而在美国则不然,有许多人对中国人分析美国并不怎么感兴趣,这些人应该很好地向中国读者学习。但我希望,而且也相信,我的中国读者们对我说的话是不会盲信的。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里,盲目接受西方极力推销的产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很值得自豪的是,她在很多关键时刻抵制了

对西方的盲从。然而,自 1978 年开始结构改革以来,有些中国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某些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物质的东西。我期望读者对本书所讲的内容进行批评性的思考,在读者和读者之间、读者和我之间展开辩论。

读者们会注意到,事实上,就从本书的英文版 1997 年上半年出版以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开始提示:我的某些论点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例如,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 90 年代的政治经济可以概括为“市场斯大林主义”,亦即经济上的自由化和政治上进行控制相结合。我也提出,这样一种结合既是走向 90 年代经济结构改革显著成就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潜在着不稳定和爆炸性。然而在 1997 和 1998 年,中国虽经历了几次潜在的危机,结构改革中也依然存在问题,但这个泱泱大国仍然保持了稳定。这样,中国就继续宣告了西方的预言的失败(请注意,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具体说来,1997 年 7 月香港回归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政治镇压,而实际上是容忍了针对政府的反对活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而并未造成经济危机:生意在 1997 年继续红火,1998 年出了点问题,但这是受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衰退的影响,这当然是一种外部因素的结果。接下来是中共十五大,邓小平以后的领导出来亮相。美国观察家们当时普遍认为,江泽民是一位软弱的和过渡性的人物,而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将会出现激烈的斗争。然而,中国再次一反潮流,既不应验此类预言,也没走领导层暴风骤雨般斗争的老路,党代会在江的干练领导下开得非常顺利。1997 年底,江泽民成功地访问了美国,从实力走向了实力。在美国的国土上,他时而娴熟地使用外交辞令,时而则坦率直言,二者的平衡度把握得非常好:有些话干脆锋芒毕露,有的地方则无异于自我批评。其政治家风度为克林顿总统 1998 年年中对中国的回访铺平了道路,这一回访将中美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当克林顿抵达中国时,魏京生和王丹已从狱中获释。总理李鹏依中国宪法的规定已顺利卸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根据本国法律从如此高的职位上下来。西方新闻媒体在报道克林顿中国之行时,吃惊地注意到中国基层政治悄悄地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它们强调指出了中国的国家正在怎样从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格控制中摆脱出来,甚至还报道了个人具有的愈来愈大的自由度——特别体现在敢于对政府的政策表示反对和抱怨。全国各地有不满意见的公民们,特别是那些因国有企业结构改革而下岗的工人们,皆可表达他们的异议。这些情况的出现,以及它们并没有遭到国家的镇压,都显示出真正的政治进步。与许多可怕的预言——也包括本书中表示过的担心相反,中国政治的正常化、合理化和稳定化在1997和1998年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人们只是希望,这种成熟不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沉寂,而是会继续发展下去。

《反潮流的中国》中文版的出版,是中国、英国和美国许多慷慨大方和勤奋工作的人们合作的结果。我的学者朋友华庆昭 and 孟庆龙提供了热情的鼓励和不倦的帮助。他们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使我对中国的前途更有信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是这一项目富有合作精神和精通专业的伙伴。平特出版社及我的原著编辑派特拉·莱克特对出版中文版极为支持。最后,在学术上,我的恩师邹谠教授使我受益匪浅,这在书中已经说明,现在又因他为中文版提了一些宝贵建议而让我更加感激不已。

1998年8月11日于俄罗斯俄州奥伯林

前言

本书的写作肇始于我的一个想法：全面修订出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破旧立新》（伦敦平特出版社 1986 年版）。同中国的情况一样，本书的结尾也出人意料，与原书大为不同。我原先未料到十年间中国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回过头来看，我在原书中没有充分预见到，中国会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改变其方针和政策。我也未意识到我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的想法以适应这些发展和变化。

本书的第 1 章和第 2 章基本上承袭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书的有关内容，其余章节都是新东西。《反潮流的中国》旨在对中国革命、中国对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以及进行的各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进行分析和研究。我采用的仍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涉及到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本书是为对中国事务了解不多的读者写的，但并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介绍。相反，书中的论点和分析都是通过社会科学理论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出的。本书既有知识性，又具挑战性。

鸣 谢

什么东西容易变老？感激。

——亚里士多德

在我们创造的这个个人主义盛行和人情淡薄的世界上，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是已故的和仍健在的许许多多人共同努力培养出来的。这本书概述了我对中国将近三十年的思考和研究，它的完成得益于从大学时代的第一堂课开始到最近为止所有为我授业解惑的学者们。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邹说所做的远比我知的多。每当我阅读他的学术著作或当年听他讲座时记的笔记，我都会产生一种极大的窘迫感，因为发现我赖以自豪的那些新观点实际上都来源于他。作为导师，他的成就非常之大，因为他竭力避免使学生们成为他的忠实信徒，而是坚持让我们自由地发挥想象力，探索感兴趣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很难判断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和想法。我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第一个激发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和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冲动。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我又幸运地得到了向杰里米·阿

兹雷尔、伦纳德·宾德、孔斐力、威廉·帕里什、肯尼思·普鲁伊特、劳埃德·鲁道夫、苏珊娜·鲁道夫和菲利普·施米特求教同学的机会。

许多年来，我周围一直有一批聪明睿智且富有同情心的同事，与我共同思考和完善学术观点。我与许慧文和戈登·怀特合作著书的经历令人难忘。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因众多的朋友而变得丰富多彩，他们是：菲利斯·安多斯、斯蒂夫·安多斯、鲍勃·贝内维克、兰迪·科尔曼、崔志远、克里斯·豪厄尔、罗恩·卡恩、艾拉·卡茨纳尔逊、戴维·凯利、丹·凯利赫、戴维·莱廷、李弘永、李连江（音）、戴维·洛夫、米奇·迈斯纳、米歇尔·穆德、凯文·奥布赖恩、胡素珊、马克·塞尔登、史蒂夫·沃尔克、王绍光、林恩·怀特第三、哈伦·威尔逊、斯科特·威尔逊、布兰特利·沃马克、克里斯廷·翁、岳明（音）和戴维·茨威格。

我还要感谢我在奥伯林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我的教室和办公室中显示出的高超的智力和丰富的学养使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和完善。他们使得教师的工作令人激动且大有收获。他们探索复杂问题的参与精神和悟性不但影响到了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而且有助于书中许多实质性内容的形成。我深切希望得到他们帮助良多的《反潮流的中国》一书能使他们之后的学生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探索精神。

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写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一些特别的帮助。弗朗西丝·平特、伊恩·史蒂文森和尼古拉·维尼卡给了我相当多的鼓励，使我得以坚持进行这项研究。菲尔·夏夫利适时地邀请我参与他的写作项目《比较统治》，令我十分高兴，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彼得拉·雷克特和菲奥纳·麦肯齐认真负责地进行了本书的编辑工作。里德·伍德再次慷慨好义地提供了许多技术性帮助。在把思想变成实在的文字、把精神变为物质基础方面，奥伯林学院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我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思考、研究和写作。不感谢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们无耻而又无聊地搞掉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使学者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难得到共同探讨和完善学术观点的机会了，而目前的世界恰恰更需要理性的分析。

谨将《反潮流的中国》献给我的家人。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与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是分不开的，他们自觉自愿地满足了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一切要求，他们的学术成就还对我产生了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威廉·俄州·奥伯林

1996年5月9日